

作为“全球化先驱”的东方世界耶稣会士

卡洛塔·米兰达·乌尔班诺
CARLOTA MIRANDA URBANO

我想首先阐释一下本文的主要论点“全球化先驱”一词。为此我必须说明，我的研究领域之一，十六至十七世纪耶稣会新拉丁语文献，给了我一个称耶稣会传教士为全球化先驱的语境。对文献的多年研究将我带到了葡萄牙在日本的存在，也就是我演讲的主题。

为了解这些全球化先驱，我们需要牢记耶稣会冒起之后第一个百年的传教语境。据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的人类学视野及其《神操》，耶稣会的任务是引领人类迈向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使徒职责是永恒之王（基督）的职责的组成部分，即拯救世间男女，遍邀全人类及每一特定个人，为了神的荣光去征服世界。

根据会规，耶稣会自创立伊始就和伯多禄的继任者教宗发生了联系，因而在教宗直接指导下宣教。耶稣会士的使命即普世教会使命，是对普世需求做出的响应。会规写道：

“[603]本会意识到，创设本会之目的，是为了使其传遍四方，到达不同之地区及文化，因此，耶稣会不得偏安一方，坐守一隅。”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贫穷、贞洁、服从（又称绝财、绝色、绝意——译者）三愿之外，会规还要求发过上述誓愿的会士宣誓效忠教宗，并且教宗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耶稣会内部存在这么一种伟大理想，即会士的使命具有普世性。我们可以从虔信者撰写的文学作品、书信及文件中看到这一意识。例如在颂扬1626年于长崎殉道的省会长方济各·帕切科（Francisco Pacheco）、不可多得的新拉丁语史诗《帕切科之歌》（*Paciecidos*）¹中，初学总管对诗中的英雄说，“别再以为你是你的祖国葡萄牙之子，帕切科是世界之子，而世界同样属于帕切科。”²

和基督教同寿的普世性使命，是对圣保禄所说的“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的回应。³在该诗的另一片段，在英雄被逐出日本转入地下传教之后，他称其使命之国日本是其祖国。⁴因而可以说，遭逐的传教士心想的是，他们的被逐是从祖国的流亡，并希望重返日本。在日本守护天使Japoniel的庇护之下，他们确实回去开展了地下传教。

在其存在最初的一百年中，就其使徒使命而言，耶稣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首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动力之一。耶稣会葡萄牙会省负

责巴西、非洲、印度、摩鹿加群岛、日本及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了开展这一庞大工程，需要其他各会省配合。这一名符其实的跨国行动的合作者，多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为了熟悉葡萄牙语，掌握传教的必需工具，许多外国耶稣会士因而纷纷前往科英布拉或里斯本，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留学一两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在科英布拉留过学（1577年7月至1578年3月）。

上述史诗赞颂1626年在长崎遭处死的帕切科的同伴的例子，阐释了耶稣会在东方世界的跨国性质。除葡萄牙人帕切科以外，其他传教士也同时被关押及处死，如意大利人巴蒂斯塔·左拉（Baptista Zola, 1566-1626）、西班牙人巴塔萨·托雷斯（Baltasar Torres, 1563-1626）、朝鲜人康万桑（Vicente Caun, 1578-1626）以及五名日本传教士东藏米盖尔（Miguel Tozo）、贞松加斯帕（Gaspar Sadamatzu）、喜作若昂（João Kisacu）、晋作佩德罗（Pedro Rinxei）及林兵保禄（Paulo Xinsuc）。

在下达传教士驱逐令的1614年，日本已有30万基督徒；1603年的纪录提到，除了140名传教士（含日本本地传教士）外，还有280名问答传道师。

在踏上远赴东方的旅途时，首批传教士对印度教、佛教或亚洲文化常识一无所知。他们接受的培训是基于欧洲对东方的认识而非东方的现实。然而在与日本初次接触后，传教士如圣沙勿略转瞬就明白，在欧洲行之有效的传教模式，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在日本，传教士应当举止文雅，聪明睿智，熟知当地礼仪规矩，而不能表现出贫穷或谦卑的模样。耶稣会士很快就意识到，传教使命的成败，取决于他们对当地语言、文化、风俗、社会、宗教以及布道对象心理状态的了解。在最初的适应阶段，耶稣会士无不费尽心机，努力学说当地语言，甚至在家也不忘练习。为了确保传教士能够被接受，他们除掌握语言之外，还需知道当地的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及准则。

在学习当地文化时，耶稣会士学会了日语读写。他们先写出了讲稿，后又印刷了用拉丁文及当地语言写的书。在1590至1614年（是年日本开始禁止基督教）间，印刷品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耶稣会传教士不仅拥有坚实的人文文化基础，还受到过良好的修辞教育。这些便是他们执行使徒使命的基本工具。基督教带给东方的

不仅是一种宗教，还带去了另一种语言及文明——拉丁文明。

刊于《日本文献，1547-1557》（*Documentos del Japon 1547-1557*）中的一份题为“*rol do fato que o padre mestre Melchior levou pera o Japon o anno de 1554*”的非常有趣的文件，明确地印证了我此前的说法：就书籍而言，在“经典”虔敬及崇拜书的基础上，该文件还列示了柏拉图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托勒密（原文如此）、《教会史》、圣奥古斯丁的《沉思录》等。这些原本为耶稣会所用的书籍，后被用于培训日本本地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成为问答传道师以及入会甚至发愿的基督徒。

在东方的拉丁文明不仅仅是一种影响现象，而是一个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文化对话进程。

耶稣会士在日本教区的印刷所不仅印制了日文版的问答传教及教义书籍，而且还出版了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日语的语法书及词典。

他们还于1590至93年间出版了西塞罗的拉丁语文本，1594年在天草出版了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神父（Manuel Álvares）的著名语法。这本在全球耶稣会学校网络中广为应用的教习拉丁语的标志性语法书，也为日本青年学习拉丁文所用。这一版本包含了拉丁文、葡文及日文的词组，甚至还用了日语句子来解释拉丁语的语法规则。其他著作包括《葡语日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um lusitanum ac niponicum*, 1595）及《日语词汇》（*Vocabulario da Lingoa de Japam*, 1603）。这两部著作都纪录了两种非常独特的文化——拉丁语及日语——的交汇。

日本基督徒贵族子弟对罗马的访问，表明耶稣会士乃首次全球化进程动力的历史事实。这次由耶稣会士推动及主导的旅行，发生在1582至1590年间（1582年造访罗马，1585年前往印度，1590年返回日本）。孟三德神父（Duarte de Sande）在其可读性很强的对话录《日本使团之行》（*De missione legatorum laponensium*）中对该次访问进行了描述。

幸运的是，由于哥斯塔·拉马略教授（Costa Ramalho）的翻译及对著作人真伪问题的研究，该书有了一个葡语版本。这位科英布拉的著名学者写道，出访意在“向日本人展示欧洲，反之也向葡萄牙展示日本。”⁵该书提供的资料异常丰富，无穷无尽。

除其他方面以外，孟三德的著作还送到了日本青年对葡语、西

班牙语、意大利语及拉丁语的掌握程度。事实上，这些青年使节不仅用拉丁文作了礼赞教宗的诗，还用拉丁文事先写好讲稿在教宗面前背诵。1578年，果阿发表了一篇致范里安神父（Father Valignano）的拉丁文演说词，作者便是青年使者之一原干马丁（Martinho de Hara）。

在上述出访发生的16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的耶稣会士也在静静地筹划如何使基督教适应东方的进程。然而早在30年前，日本就有了纪录基督教如何在日本东部本地化的文件。

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的一封写给1556年继会祖罗耀拉出任耶稣会总会长的莱内斯（Diego Lainez）的拉丁文书信，汇报的就是这一情况。这封1995年前一直湮没无闻的信件，不仅反映了耶稣会士对中国及日本宗教与文明的浓厚兴趣，还透露了传教士在应对东方思想及神学的语言本质时感受到的沟通困难。

在与总会长分享的诸多思考中，巴莱多提到了日本梵僧与基督徒在教义上存在着共同之处的事实引发的问题，兹转引如下：

梵僧公开宣导，万物之源（他们称作Fotoque）一如理性灵魂（他们称作tamaxe）；另外他们说有天堂地狱，凡此种种与我教义相同。因此在大规模皈依之初，日人告我修士，他们的创世神Xaquá和Amida也与我们的一样。⁶

梵僧所看到的确实存在的共同点，毕竟有碍基督教的融入。事实上，传教士需要将自己的宗教实在与佛教的实在加以甄别。前文所引信件的作者认为，当地语言的使用，妨碍了应被严格视为基督教新实在的传播。

正如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摒弃了一些被认为含有异教实在意义的拉丁术语一样，日本的传教士在创造新词及运用希腊和希伯来术语来指代新实在的同时，也不允许使用他们开始时使用的日语术语，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些术语的“实质”与他们的所指，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兹引述如下：

“我们的日本教友明白，由于名词的变意，他们对我们用日语向他们解释的一切神圣事物都产生了误解。更有甚者，即便是通过布道或争辩获得了大量的灵修知识，他们仍旧积习难改。因此，鉴于日本教友对词语的内涵理解有误，我们的耶稣会弟兄便全部摒弃了那些词汇，因为它们天主教信仰的毒药。⁷于是‘Fotoque’就为‘天主’所取代，‘tamaxe’成了‘魂’或‘灵’。即使平时说写都用日语，但

在宣讲灵修和神圣实在时，他们却像躲避致命的瘟疫那样回避日语词汇，改用葡语或拉丁语。事实上，他们用拉丁语教习我们的祷告词和使徒信经，但所有的解释和阐述都用日语，深奥的东西因此变得更易理解。拉丁词汇因此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受到敬重。”⁸

这些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们研究了佛教，不仅仅是想用禅宗的问答法与梵僧进行对话辩论，而是试图找到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最佳方法，建立真正的基督教社区。后来到了17世纪初，问答传道师的培训大多在耶稣会设于有马的学校及神学院进行，他们学习拉丁语及日本宗教，目的是对后者进行批驳。⁹

这些传教士（有时与熟悉当地宗教的日本人合作）撰写的问答传教书，是研究远东宗教（尤其是佛教）的极其宝贵文献。

基于这些文献，我们因此可以说，在经历了主要是用当地语言传播福音（虽然拉丁语为礼拜用语）的初始阶段，第一批传教士首先对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吸收、继而对他们的基督徒身份产生了疑问，进而逐渐避免使用指代基督教基本概念的日语词汇，并最终采用了双语或者甚至三语（拉丁语、葡语和日语）的传教模式。

尽管开初蒸蒸日上的基督教福音传播事业后来遭受了灭顶之灾，拉丁和欧洲文化仍在日本留下了一些痕迹。19世纪（1865年3月17日）法国传教士抵达日本后，在九州岛遇见一个后来被称之为“隐居基督徒”的社区。这个基督徒社区在没有传教士、没有圣书、没有圣礼的情况下生存了两百年。他们告诉新来的17世纪传教士的后裔以下三点：承认罗马教权，热爱圣母玛利亚及禁欲。有趣的是，对他们的祷告词进行的语言分析，发现了拉丁语的痕迹。¹⁰

植根于基督教普世性并继承了欧洲的希腊及罗马文化的普世心态的耶稣会传教区，将其传教士打造成了全球都市的公民。话虽如此，在打造全球化身份的过程中，耶稣会士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忽略当地文化。

- 1、佩雷拉，巴托洛梅乌，《帕切科书》（*Paciecidos libri*），第12卷，（Coimbra, 1640）。关于此诗，参见“耶稣会士巴托洛梅乌 佩雷拉的《帕切科之歌》：一部对17世纪发生于日本的福音传播及殉道的史诗性评说”，载《葡萄牙/日本研究专刊》2005年6/12月，10/11,6-95页。
- 2、“Non patriae, aut Lysiae genitum te crede, Pacecum/ Sed mundo deberi omni, mundumque Paceco”，参见《帕切科之歌》，第7卷，173-174页。
- 3、参见《格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
- 4、“Hic domus, hic patria est...”参见《帕切科之歌》，第2卷，317页。
- 5、拉马略，A.C.，“A Europa aos olhos dos Príncipes do Japão”，收录于米兰达、苏亚雷斯、乌尔班诺编《*Latineuropa: Latim e cultura neolatina no processo de construção da identidade europeia*》，（Coimbra: 2007），269-279页。
- 6、Bonzi enim publice edocent esse primum rerum omnium principium quod illi nuncupant fotoque esse itidem animam rationalem, quam dicunt tamaxe; necnon esse paradysum ac gehenam et alia id genus multa instar nostrorum dogmatum. Unde fratribus nostris in exordio conversionis saepenumero inculcabant gypones se a suo Xaqua et Amida (sic enim uocant inuentores suorum errorum) eandem fere doctrinam cum nostris habere comunem. 参见《日本文献，1558-1562》，Ruiz-de-Medina编，《耶稣会历史文献汇编》（*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148卷，（Roma, 1995），109页。
- 7、Cum enim socii nostri uiderent gypones ex huiusmodi nominum corruptela, in omnibus diuinis idiomate gyponico illis explicandis, falsos accipere conceptus, et quantumlibet de spiritualibus docerentur-partim concionibus ac disputationibus, partim libris quos eorum lingua composuerunt-semper regredi in pristinos errores, propterea quod falsum intellectum formarent iuxta interiorem uocabulorum significationem, omnia illa uocabula ueluti toxica fidei catholicae respuerunt. 同上，110页。
- 8、Et pro fotoque deum, pro tamaxe animam seu spiritum uocant. Et etiam dum japonice loquuntur uel scribunt omniaque illa nomina rerum spiritualium et diuinarum lusitano uel latino idiomate edocentes, sua ipsorum tanquam damnosam pestem euitant. Quippe orationes nostras ac symbolum apostolicum latina dictione, non japonica, docentes, ac omnia japonice-paraphrastica elocutione- explicantes, faciunt ut res intelligatur; latina tamen uocabula, tanquam sacra, inuiolabiliter obseruentur. 同上，111页。
- 9、Lopez-Gay, J., “17世纪的日本传教方法”（“Métodos misioneros en el Japón del siglo XVII”），见《耶稣会与东方传教区》（*A Companhia de Jesus e a Missão no Oriente*），（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103-116页。参见115页。
- 10、参见Mezzardi, Vismara, *La Chiesa tra Rinascimento e iluminismo*, （Roma: Città nuova editrice 2006），47页。